



楚文化研究会 编

(第二集)

楚文化研究论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二集)

楚文化研究会 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8.7万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16—00695—x
G·125 定价：5.20元



目 录

序

——对楚文化总体研究的一点期望·····俞伟超 (1)

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李学勤 (5)

试论“滞缓期”的楚国经济·····马世之 (11)

考古所见楚国铁农具初论·····郭胜斌 (17)

楚郢都的制陶手工业·····杨权喜 (30)

试论楚墓出土漆器的产地问题·····陈振裕 (44)

东周时期楚国的玉器及有关问题·····杨立新 (57)

从安徽繁昌县出土蚁鼻钱铜范来

探讨楚“𠄎”字贝的铸造工艺·····汪本初 (74)

楚删略考·····刘彬徽 (81)

包山 2 号楚墓用鼎制度的推定·····胡雅丽 王建苏 (93)

安徽楚墓研究·····吴兴汉 (101)

湖南晚期楚墓及其历史背景·····何介钧 (112)

包山 2 号墓的年代与墓主·····王红星 (125)

再谈浙川下寺 2 号墓的墓主与年代·····赵世纲 罗桃香 (133)

舒城九里墩墓主考·····杨德标 (143)

楚俑略说·····王从礼 (151)

果品与祭祀

——从信阳楚墓出土植物种子遗骸谈起……………裴明相(164)

战国长沙楚城初论……………黄纲正 吴铭生(167)

湘西北楚城调查与探讨

——兼谈有关楚史几个问题……………曹传松(177)

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丁邦钧 李德文(191)

楚音乐略说……………舒之梅(199)

楚国乐器初论……………谭维四(210)

楚国青铜砣码中的数学问题……………后德俊(223)

蔡侯墓文化属性试析

——兼论楚式青铜器的形成及其外因……………刘建国(229)

略论秦镜及其与楚镜的关系……………高至喜(243)

论黄国与黄国青铜器……………何光岳(260)

古文字资料所见楚国官制研究……………罗运环(270)

“楚亡中山”辨正……………何 浩(290)

“蕲郢”辨析……………黄锡全(311)

包山二号楚墓《卜筮祭祷》

竹简的初步研究……………彭 浩(325)

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铭文通释……………陈秉新(348)

后记……………(365)

序

——对楚文化总体研究的一点期望

任何学科的科学的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当然，每个层次的研究皆互为关联。抽象研究只有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高层次的抽象研究也只有在较低层次的研究已有相当基础时才能进行，而当抽象研究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新产生的新要求又会促使具体的、较低层次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这个过程几乎是无限的，因而不同层次的研究也都将是无止境的。我想，我们应当这样来观察以及预测楚文化研究的进程。

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就其主流而言，似乎已经走过了古器物学的研究、年代分期的研究等阶段而正在进行概括文化特征和划分区系类型的研究，有关精神文化及社会关系等研究，亦已开始了。有了这样一些基础，从物质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对楚文化作总体研究，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了。

其实，“楚文化”一词的本身概念，就包含了这样的内容。1981年6月在“楚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会议上，我曾对考古学中楚文化的概念，发表过如下看法，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族属范围、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在这四个方面中，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是最重要的”（已收入《先

秦两汉考古学论集》24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里所谓的“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就目前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是指通过研究考古学遗存的工艺技术、形态特征、占有物资程度的差别而抽象出自身的一般特征（包括社会面貌的特征）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但其本体意义却类同于当代人类学中“文化”一词的概念。在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文化”一词的实质概念，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内容。例如相当流行的克鲁勃（A. L. Kroeber）和克留克豪汉（C. Kluckhohn）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包括着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借助于符号的使用而学会它或传授之，并且构成为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由历史的延袭或选择而产生的）观念，观念是尤为重要的。文化体系虽然可以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又可看作是一种限制人类去作其他活动的因素。”^①克鲁勃和克留克豪汉两氏说的“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包含了人类群体的一切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当然属于观念的范畴，可是人类的一切行为又莫不受其观念的制约。所以，如依这种范畴而言，所谓“文化特征”，也就包括着一切行为的产物的特征，人类群体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自然统统包括在内。“楚文化”的完整内容，应当包括这些方面；过去所进行的楚文化的研究，也已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些方面。

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人类群体的行为，当然可以分割为若干不同的部分，从而能对不同的行为去作分别的研究。可是不同行为之间，又都存在着不能完全割开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会决定某些行为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而，要真正理解人类群体行为的必然性，还应该探求出不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① 《文化：一个关于观念和定义的批评性的回顾》，见哈佛大学《彼保台博物馆的美国考古学和民族学》第47卷第1号，第181页，1952年。

我在前面提出来的要对楚文化作总体研究，其要点就是寻找楚文化中的各种行为的必然关系，从而能认识到楚文化的总体特征。

这既然是新提出来的—种研究方法，今天当然还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研究成果。但如果从楚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再旁及比较一些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有若干现象却已促使我们去思考究竟有哪些潜藏着的必然关系？

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其他的一些诸侯国，正存在着不同的哲学思潮、文学风格和艺术作风，而同一区域内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乃至政治体制的特点，又有一些息息相通的意味。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互为制约的联系，或者说是存在着一种决定其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相通特点的“文化观念”。

请看下列的一些大略现象：

在楚地，老庄哲学发源于此，直到汉初，仍然流行黄老学说。屈原的《楚辞》，大量依托神话传说来表达其激愤之情，文采风格正与老庄著作（特别是《庄子》）颇有相似处而具特点。绚丽的漆画，亦多姿态奇异的神灵图像。贯穿于这些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超脱人间的幻想色彩，远远强烈于黄河流域而是这个区域所特有的。

在鲁地，出现了孔子和孟子。孔孟之道以阐述人间的伦理道德观念为重，此地的工艺风格却似平淡而拘谨。这二者是否也有其—致性？

在三晋，诞生了法家学说，强调法治而力主耕战。就青铜器的装饰而言，表现等级差别的礼仪活动，正是流行的图像题材。强调法治和强调等级差别，当然就是一种观念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秦地，商鞅、韩非、李斯的法家思想，占有长时期的统治地位，专制主义的控制比其他诸侯国还要厉害。秦始皇陵墓区内

出土的大量陶俑，除了为表现其武力强盛的目的以外，严厉的、沉重的表情，恐怕也就是那种严酷的专制主义精神的艺术体现。

上举现象，当然只是极为片面的；所作笼统解释，也是非常表面甚至可能是牵强的。但即使仅仅有这一点认识，却触发我产生应当寻找决定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的总体特点的“文化观念”的想法。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不过万事都有个开端，值此《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编辑完成之际，我提出这个期望，希望有更多的人也来考虑这种想法，并且开始进行这种工作。

俞伟超

1989年12月25日

凌晨于北京小石桥

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

楚文化兴起的背景，是江汉地区的开发。《诗·商颂·殷武》称“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是武丁之时中原势力已深入江汉。商末，楚又与周发生密切关系。《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时“太颠、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楚世家》又载：“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曾孙“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这些记载说明，从文王到成王之世，周人的统治已及于江汉地区，而楚即其封国。近代有些学者颇怀疑此事，认为商周王朝当时未必能南及江汉，封楚尤为后人伪托。

关于这一问题，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考古学上的证据。前几年，在周原甲骨文中发现了“楚子”的记事^①，后来又在包山竹简里释出“鬻熊”之名^②，可和《史记》相印证。某些文物的研究，也揭示出新的有关线索，我认为，迄今为止与周初经营江汉有关系的文物，最重要的应推有名的太保玉戈。这件玉戈，我曾两次就原物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李学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

仔细观察，也作过一点论述^①，但语焉未详。这里想进行较详细的讨论，供关心江汉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各位参考。

玉戈的发现情形，以庞怀靖先生所述最为翔实，他说：“岐山武宗仁同志家藏裱装过的古物拓本一幅，题名‘召公玉刀图’。其实是一件有铭文的‘太保玉戈’全形拓本。此玉戈系清光绪二十八年，武宗仁曾祖武敬亭先生向逃避八国联军侵略而暂住西安的慈禧太后请得国库专款，在岐城西南八里之刘家原创修召公祠时，于掘土中偶然得之。”^②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清末曾任咸阳令的杨调元对此也有记述：“右周召公玉刀，为岐山武敬亭茂才建召公祠时掘土所得，凡有二，俱长今营造尺二有奇，博三寸。一无铭，一铭二十九字，横刻柄之上。”^③据柯昌济先生《金文分域编》卷十二称，玉戈出自墓葬，“他器甚多，皆不能名，又有金冠一枚。”

这件有铭文的玉戈出土后，归端方所有，收入其《陶斋古玉图》，有摹本。端方死后，1919年流出国外，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另一件无铭的戈，则不知下落。陈梦家先生在50年代的《西周铜器断代》文中有所讨论^④，并发表了玉戈的局部照片。近年，庞怀靖、石志廉^⑤两位先生也有论文发表，后者附有拓本（缩小）。

玉戈的形制很大，陈文说“戈长67.4，最宽10厘米”，石文依拓本度量，实长66.3、最宽9.8厘米。表面光滑，呈灰白色，布有黑色斑点。直援，上刃微作弧形，锋尖偏下，下刃则平直，有一

① 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海外访古记》（二），《文博》1986年第6期。

② 庞怀靖：《跋太保玉戈》，《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③ 杨调元：《周玉刀释文》，《国学》第3期，1915年。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又（五），《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⑤ 石志廉：《周初太保玉戈》，《中国文物报》1989年第23期。

处小的缺损。援本刻有交叉的细线纹，援中起脊，且做出上下刃缘。无阑，长方形内，于近援处有一小圆穿，内端略斜，成下倾状。铭文刻于援本一面，紧靠细线纹，字小如粟米，共27字，作两行，首行23字，次行4字。释文尽量用今字写出如下：

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鬯走百人。

香港中文大学杨建芳先生曾对商代玉戈的形制演变作过研究^①，他指出，玉戈的中脊在商代中期开始出现，至晚期而盛行。商代晚期玉戈的“脊由二下凹之浅波槽相连接而形成。脊上端尖锐，下端两侧呈浅凹槽状”。此种浅波槽“乃以具凹面之砺石往返磨擦援表面之结果，欲使波槽前后深度一致，实非易事”。陈文提到，太保玉戈铭文“第13字正在戈身中部，为一长划所刻去，因知铭文先刻，后刻文饰”。在局部照片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在细线纹和铭文都已刻成后，又在脊两侧作了加工，使波槽加深，中脊更显突起，从而打破了“国”字和部分细线纹。这种加工方法类似商代晚期玉戈，其年代也必然接近。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有另一有铭玉戈^②，除援短、锋呈三角形外，颇与太保玉戈相类。其援本处交叉的细线纹侧，也有1行铭文，时代为商末^③。这同样说明，太保玉戈的年代应属于周初。

玉戈的文字非常细小，类似商末周初的一些甲骨文。这种甲骨文以文字有如后世微雕而著称，至今已在三个地点发现：（一）

^① 杨建芳：《商代玉戈之分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3卷，1982年。

^② 罗越：《中国古玉》（英文），29，福格艺术博物馆，1975年。

^③ 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文史》第19辑。

殷墟：有1950年四盘磨出土的一版卜骨^①和近年发现的一版卜甲^②。（二）周原：岐山、扶风均出，而以岐山凤雏所出为多^③。

（三）北京房山镇江营：凤雏卜甲中文字特小的，有些已证明属周文王时^④，所以殷墟所出也可能属于商末。镇江营卜骨则出自西周早期地层。凡此都证明，这种细小文字是一定时期特有的风格，太保玉戈亦不例外。

玉戈的年代，可由铭文中“太保”而推定。太保为周代三公之一，但无论在文献还是在金文中，西周的太保只有召公一人^⑤。《尚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可知召公之称“太保”是辅相成王。考虑到玉戈不少地方承袭商末的特点，其年代很可能是成王时，特别是成王的前期。

戈铭“太保”必为召公，是其出土地点说明了的。文王迁都之后，将周原故地分封周、召二公。召公所封采地后称召亭，《清一统志》云：“召亭，在岐山县西南。杜预《左传》注：‘召，采地，扶风雍县东南有召亭。’《水经注》：扶风‘雍水东经召亭南，故邵公之采邑也。’……《括地志》：‘召亭在岐山县西南十里。’《明一统志》：‘召公亭在县西南八里，今名召公村。’”出玉戈的刘家原正在岐山县西南八里，故庞怀靖先生以为即召亭所在。这样看来，发现玉戈的墓葬很可能与召公有关，旧传为召公墓不是毫无根据的。

铭文开端纪月日为“六月丙寅”。这种形式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在自组卜辞中比较多见，如美国辛格氏所藏卜甲有“十二月乙丑贞曰：戊寅其雨。旬四日雨”^⑥。其例不烦多举。“王在

①③ 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④ 李学勤：《论周文王时期的四片卜甲》，《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1988年。

⑤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1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⑥ 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3，1，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

丰”，丰即在今陕西长安沣西的丰京。“令太保省南国”，是命召公省察周朝的南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云：“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可知当时所谓“南国”的大致范围。成王在丰，命召公往省南国，与《尚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句例相同。《书序》之“相”即铭文的“省”，均为省察之意。“帅汉”，“汉”指汉水，“帅”训为循。从丰京前往南土，自当沿汉水南下。

“遂殷南”，“殷”意为殷见，即诸侯会集向王朝见。这种典礼是在王主持下进行的，商周金文不乏其例^①。殷见常分四方，如保尊、卣“殷东国五侯”，即由东土的五等诸侯朝见。此铭“殷南”，是殷见南国的诸侯。请注意“殷”的主语是“王”，不是太保。举行殷见典礼的地点，估计是在周都，并不在南国。由此可知，成王命召公巡省南国，沿汉而下，是为了召集当地诸侯来朝之事。由当时历史情况来看，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以后，是巩固王朝南方统治的一项措施。

“令厉侯辟”，“厉侯”又见北宋时孝感所出中解（昭王时器）。我们曾论证，厉即今湖北随州以北的厉国^②。据《逸周书·世俘》，武王伐纣归途，命韦伐厉得胜，那是商朝的厉国。至此成王“令厉侯辟”，“辟”训为“君”^③，是封属于周朝的厉侯。厉国直到春秋时，才为楚国吞灭，其始封实见于此。

“用鼋走百人”，“用”训为“以”。“鼋”^④读为“驺”，为御者，“走”则是仆人。“以驺走百人”，指赏赐厉侯仆御一百名，命之就

① 李学勤：《鄧其三卣与有关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②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③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二，第93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④ 参看刘钊：《甲骨文字考释（十篇）》，198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纪念活动论文。

封。

召公与南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诗经》中的《召南》，就是由于召公取风于南音而出现的。

《毛诗序》：“《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传云：“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正义》：“文王之国在于岐周，东北近于紂都，西北迫于戎狄，故其风化南行也。”《诗序》又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传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为二伯，后封于燕。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云。”按周公、召公为二伯，指分陕而治一事，据《公羊传》隐公五年及《史记·燕世家》，正是成王时的事情。如果上引文献可据，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这和太保玉戈铭文完全符合。

因此，周初的江汉开发是当时历史一大关键。载籍所述鬻熊事文王、熊绎封楚蛮等事，正以此为背景。研究楚文化的兴起，似不可忽略这一点。

试论“滞缓期”的楚国经济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一支极其灿烂的历史文化，它同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一起，被誉为“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区域文化之花”。楚文化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张正明先生把它归纳为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和转化期五个阶段，这样的分期法是根据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得出的结论，因而大体上符合楚文化的历程。楚是东周时期的一个经济强国，当其全盛之时，“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陔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①。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张张扬扬，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秦将白起率军东征，于公元前278年一举拔郢，楚顷襄王仓惶出走，“东北保于陈城”，从此结束了楚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进入“滞缓期”阶段，直到公元前223年（负刍五年）楚亡为止，大约延续了半个世纪。这个阶段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晚期，楚国积弱，一蹶不振，虽然仍不失为一军事大国，但在经济上却每况愈下，呈现出一派衰落景象。

众所周知，城市“是以空间与环境利用为基础，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以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它是一个经济实体、政治社会实体、

^① 见《史记·苏秦列传》。

科学文化实体和自然实体的有机统一，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①。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楚国全盛时期的郢都即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是当时我国南方的第一大都会，从公元前503年—前492年间楚昭王迁都于此起，到公元前278年沦陷于秦止，楚国在此建都长达200余年之久。纪南城规模巨大，城垣周长15506米，城内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史记·货殖列传》说：“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它在楚国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纽带的作用，是任何别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滞缓期的楚国都城有二：一为陈城，今河南淮阳。《史记·春申君列传》云：“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陈县。”陈城是陈的国都，公元前478年楚国灭陈设县，故称陈县。从楚顷襄王都陈起，到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东徙止，楚国在此建都38年，史称“郢陈”。郢陈内周长9里13步，约合4500余米，城内总面积近1.3平方公里。外廓城城垣周长约15公里。郢陈的宫殿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情况不详，仅在城东南5公里的大连乡大吕村一带，发现楚国贵族的墓地。楚都陈后，曾对内城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葺，城墙向外拓宽4.4米，向上增高1米多。为求坚固和筑城方便起见，这次修葺时普遍将2—3米长的横木置于夯土层中作栓，共用横木4—6万根。这种新的筑城工艺，“透露了楚的恐慌心理，也显示了楚国尚有不可低估的实力”^②；一为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本是蔡国最后的都城下蔡，公元前447年楚人灭蔡，其地属楚。《史记·春申君列传》载观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在强秦的威逼下，不得不

① 李铁映：《城市问题》，见《中国城市科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张正明：《楚文化史》第304～3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放弃陈城，再次迁都，东徙寿春，到公元前223年秦虏楚王负刍止，楚国在此建都近20年，史称“寿郢”。寿春城址在今安徽寿县城南和东南郊，其范围大体上为：西至今城西门，东北两面以淝水为濠，南至东陡涧河（古黎浆水）北六公里即今东津乡八里村十里头以北。今在寿县东南郊柏家台子发掘一处战国晚期建筑遗址，面积达数千平方米，地面铺有方砖，应为楚国宫殿建筑。城东约25公里处的朱家集南李家三古堆大墓，封土覆盖范围直径约200米，1933年—1938年间3次被盗掘，出土文物数千件，大约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之墓。朱家集所在的赖山乡（今属长丰县）小孤堆、大孤堆、杨公、李家三古堆一带，可能是楚国的贵族墓地。《史记·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汉书·地理志》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陈与寿春都是楚国的重要商业中心，但在城市规模、宫殿建筑、商业和手工业方面，均不能同郢都相提并论。

秦军拔郢，楚之大片国土沦丧，昔日四通八达的商道，一时为之阻塞，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1957年和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5枚，有舟节和车节两种，分别为水路和陆路通行的凭证，从节铭“大司马邵（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可确知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鄂君启是鄂（今湖北鄂州市）地一个名叫启的楚王封君。鄂为长江以南的古代水陆要冲，是郢之东部门户。此节规定了鄂君启经商的商车、商船数量、行经路线、外出时间、所过关卡和免税物资范围。以舟节为例，规定鄂君启经商的四条水路为：一、西北路从鄂城出发，经过今鄂州、武昌之间的吴塘、梁子、牛山、汤孙等湖，自鲧鱼口穿过长江，溯汉水北上，经唐白河，到达南阳盆地；二、东路从鄂城出发，顺江而下，可抵松阳（今安徽枞阳），通过淠江，可达爰陵（今安徽陵阳）；三、西南路自长江入湘水，可到今广西全县和湖南郴县；四、西路由长江西行，溯荆江可达郢都。《史记·秦本纪》载：